

# 中国历史上的商业传奇，如何在影视剧中生动呈现

——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之后，谈谈商业传奇剧中的商业文化与精神

李清霞

电视剧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的热播，让商业传奇剧再度回归人们的视野。

进入新世纪以后，随着《大宅门》《大染坊》《乔家大院》等电视剧的热播，商业传奇剧成为新的类型剧，并一度成为电视剧市场的宠儿。《大宅门》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，并以17.74点的收视率夺得2001年央视年度收视冠军；《乔家大院》不仅夺得2006年中国内地电视剧收视冠军，还获得第26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一等奖、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优秀电视剧等奖项。商业传奇剧以商战、家族、英雄传奇、爱情为主要元素，套用成长小说的故事模式，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；同时成为新的类型剧，尽管出现了大量同质化类型化的剧作，但也有不少作品在努力实现思想艺术上的突破。

电视剧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中，孙俪扮演的周莹传承“诚信”的商业思想，最终成为一个入硬、货硬、脾气硬的“三硬”商人



使观众更容易产生历史代入感

以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和物为原型，是很多商业传奇剧的共性

以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和物为原型，以人物命运起伏为主线，主要故事情节“史有实录”，是很多商业传奇剧的共性。比如《大宅门》中百草堂的原型同仁堂是家喻户晓的品牌，胡雪岩是历史人物，《乔家大院》的乔致庸也有人物原型，等等。这样的情节与人设，使观众更容易产生历史代入感。

商业传奇剧大致有以下几类：一是家国同构的“宅门”系列，以《大宅门》和《乔

家大院》为代表；二是商业传奇英雄系列，以《大清徽商》《大清盐商》等为代表；三是“商道”系列，以《闯关东》《走西口》《大商道》为代表。这三类商业传奇剧既有共性，也有个性，在情节与人物设置上既有侧重也有交叉。

共性主要表现在把家族叙事与商业英雄传奇相结合——我国历史上的商业帝国多是家族企业，家族与商号荣辱与共，家族的掌

门人与商业帝国的统治者具有同一性，几乎每一个商业帝国都有一个超级英雄，如白景琦、胡雪岩、乔致庸等。其次，女性与情爱是英雄成长的催化剂。成功的商业传奇同时又必然是一部情感大戏，情感戏份就像佐料，多少很难把握，《大宅门》塑造白景琦这一商业奇才与浪子的同时，也塑造了白文氏、杨九红、香秀等女性形象；但《乔家大院》等剧中的女性形象就逊色很多，成为男性成长的工具和剧情发展的佐料。

个性方面，“宅门”系列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，如《大宅门》的京味，《乔家大院》的晋文化特色等。商业传奇英雄系列则注重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，在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之

或官府密切相关。这无疑给商业传奇剧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。

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，尽管英雄的性别由男性置换为女性，但仍然继承了商业传奇剧的主流传统。该剧开篇并不讨巧，周莹一出场就是活脱脱的“小燕子”，继而转入官斗模式和“玛丽苏”套路，女性的成长与逆袭有赖于她身后的那些男人，女性的价值也是通过征服男性才能实现的。这一俗套在周莹远赴西北以胆识和智慧化解危机后才开始突破，排除众议购得陕西织布局全部股份及之后的一系列行动，才让观众看到一个“树”的形象与男性并肩站立的女性形象，周莹在经历了吴蔚文、蔚文商业启蒙，及沈星移、赵白石、图尔丹、王世均等男性的扶持、爱慕与追随后，终于成长起来，可以独当一面，开始具有自觉的现代意识和女性意识。周莹继承了吴家“诚信”的商业思想，成为一个人硬、货硬、脾气硬的“三硬”商人，她勇于开拓，善于变通，能够与商业对手及合作伙伴共享利润；

前，此类剧作是典型的“大男主戏”，剧中所有的人物，都是为这唯一的英雄而存在，女主的戏份也不能与男主相抗衡，比如胡雪岩，所有女性角色都为男性英雄成长而服务。“商道”系列，顾名思义，是讲述行走路上发生的故事，即在商业英雄开辟商道、建立商业帝国的行走过程中，将自然风光、异域风情、民族文化与国家民族命运、商战等有机融合，给观众带来视觉的冲击力，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效果。如《闯关东》中山东沿海、关东雪原、哈尔滨等场景的转换，《走西口》中商道上步履缓慢的骆驼队和悠扬婉转的信天游，以及《大商道》里的库仑草原等，都为剧作增色不少。

她首创股份制，使吴家从掌柜、伙计到织工、丫鬟命运休戚与共，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，这种商业理念与经商之道，即使在现代，依然具有进步意义。

周莹不惜重金修水利、办学堂、建桥修路、赈济灾民，却不肯趋炎附势捐银子供太后皇上享乐。她不仅是一个具有家国情怀、济世理想的女商人，还是一个执着追求真理与正义的奇女子。吴家因“军需案”家破人亡，她从朴素的民间伦理出发，坚信公公和丈夫是遭人陷害，发誓要查明真相，为吴家讨回公道。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，她深刻认识到清廷的腐败，自觉接受了变法图强的维新思想，投资创建泾阳布厂，走上以民族工业振兴祖国的道路。

可以说，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通过女性成长的主题，将商业传奇剧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，中国现代民族企业与爱国商人始终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。我想，这也是该剧最大的价值所在。（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）

创作谈

## 知惭愧

——《书到今生读已迟》

的书名和辑名

黄德海

诤友汪松谈到我的书《书到今生读已迟》时，使上了春秋笔法：“让我醉心不已的是书的目录。目录的主体是三部分，第一部分‘跳动的火焰’；第二部分‘爱命运’，从一到二，仿佛‘跳动的火焰点燃了火把’，由外而内；第三部分‘目前无异路’，讲成长模式，是黄德海观察世界而世界也因此显现的方式，可以说是由内入密。我对着这个目录思索良久，回忆、想象每一个题目后面的内容，甚至想按照题目各写一篇文章。”照我的理解，这话的意思差不多是，我应该把书中的文章尽数删去，照着这三个辑名，重新来写一遍——真是让人振拔的话。

就来说说书名和辑名。谈到书名，实在惭愧得紧。我早就从各类杂书上看到过这句话，似乎跟苏轼和黄庭坚有关，可怎么也查不到确切的出处。后来，终于在《随园诗话》中找到：“谚云：‘读书是前世事。’幼时，家中无书，借得《文选》，见《长门赋》一篇，恍如读过，《离骚》亦然。方知谚语之非诬。毛侯固广文有句云：‘名须没世称才好，书到今生读已迟。’”确切的出处，应该是这里。可我不怎么喜欢袁枚，就像这段话，里面有一种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孤高自负，反失了自然。不过，话仍然是好话，并且我用的意思跟袁枚正好相反——是说自己没有宿慧，读书迟，出书也迟，所以就还是取了这名字。

书的第一辑“跳动的火焰”，出自柏拉图《书简七》：“通过不断交谈，与问题共同生活，它就突然产生于灵魂之中，就像跳动的火焰点燃了火把，立即自足地延续下去。”这一辑，是借唐语（《眼前》谈到《左传》，进一步谈到《春秋》，倒过来看，仿佛从先秦的《春秋》开始，一路迢迢说到了现在，那过往的和现在以好为目的的一切，虽屡经阻碍甚至所伤，却仍如跳动的火焰般传递了下来——“那自古人绵延至今的善意、善念和无比艰难的善，虽不絶如缕，却依然流淌在不息的时间长河之中，婉转地传递到了有耳能听的人心中。”

第二辑“爱命运”，主要写崎岖起伏世界里的形状，既羡慕玻尔、海森堡、薇依这样的心灵，也揣测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意思差不多是要说，“在好的生活当中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对的”。这其实是我读蒙田的一点收获，稍微到了我以在对尘世过于严厉的一点批评，自我在内在的某种意义上略略放松了一点，也因此能够较为平静地接受“全身是裂缝，四周都漏水”的人，尝试着接受那个“身上全是痼疾之气”的自己。对，就是慢慢地学着“爱命运”（amor fati）：“放弃控制，随波逐流……不论发生什么，都欣然接受。”我慢慢有些相信，“不完美、不明确、不恰当且易被人曲解，反而变得更好”。

上面的意思看起来有点消极，其实不然，甚至有可能是人能采取的最有效的积极方式也说不定。南宋高祖刘夔（广主）至云门文偃处，曰：“弟子请益。”云门答：“目前无异路。”就是眼前这条路，没有其他的可供选择，这正是第三辑辑名的来历。这辑写的，是我理解的金庸、金庸木、张五常等人的成长故事。从他们的成长轨迹，差不多可以看到，那捉摸不定的命运从不许诺一劳永逸，也来不及事先安排，更无法提前准备，何况大多数时候，准备也无济于事。集全全部心力于一处，心无旁骛，解决眼前遇到的问题，一个人的成长，是不断地专注于每个眼前，一步步超越超越走出来的。

当然，必须郑重说明，以上的说法只是鼓励性的自我期许，并非做到之后的现身说法。对我，或许对广松兄也同样，大概都愿意记得下面的故事。有一次，色诺芬被苏格拉底拦住去路，问他在哪里可以买到各种食物，色诺芬逐一道来。话锋一转，苏格拉底紧接着问：“人在哪里可以变得美好？”色诺芬茫然无对。“来跟我学习吧。”苏格拉底吩咐道。或许是这样——只有具备了未来的向上可能，才能稍微缓解一下我谈论自己时的脸红心虚，从而有转变为知惭愧的微弱希望。（作者为青年评论家、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）

只能从中国历史出发

中国的商业传奇剧不可能套用西方的故事模式，也不能完全套用武侠剧或宫斗剧的故事模式

真正为商业传奇剧打下文化底色、赋予精神内涵的，则是中国特有的商业文化与商业精神，如诚实守信、勇于开拓、坚韧顽强、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。真正的商业英雄必定是有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的。83版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提升了江湖英雄的精神品格，快意恩仇的侠义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，注入了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，并具象化为郭靖这一英雄形象，浓缩为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的经典表述。商业传奇剧借鉴并套用了金庸的这一手法，塑造了一大批“为国为民”的商业英雄的形象，传承了同仇敌忾、众志成城、扶贫济弱的民族文化精神，呼应了观众的文化审美期待。

然而，文艺作品如果仅有口号和说教，

是不可能得到观众认可的。中国的商业传奇剧不可能套用西方的故事模式，也不能完全套用武侠剧或宫斗剧的故事模式，它是从中国历史出发，对中国的商业传奇进行叙述的。

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有重农抑商的传统，这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商人的身份与地位艰难而尴尬，夹缝中生存是其真实写照。一方面，商人在繁荣社会经济，保障货物流通，增进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，特别是国家民族遭遇外族入侵，面临突发事件与自然灾难时，商人们总是以民族大义为重，以百姓疾苦为重，出钱出力，与国家民族共存亡，牺牲小我的利益，维护民族的尊严与社会安定；但另一方面，封建时期，那些庞大的商业帝国，其建立与覆灭都与朝廷

书边札记

新近出版的《微观红楼梦》是一部红学随笔集，收录作者读红札记59篇，前楔《自序》，巧成一个甲子之数。这些篇章短小精悍，率性而论，但作为整体，信息量为巨大，且自成规模和格调，内容涉及《红楼梦》的思想与艺术，尤其以勾稽、论述清代民俗、艺术、风物、道里，诸如饮食、服饰、建筑、节日、古玩、名人旧迹等最为精细，征引的文献遍及古代经史、文人别集、稗说杂剧以及域外论著。

以欣赏的心态读《红楼梦》，以散文——也即文学的笔触涉足红学，重在抒发个性化感悟和见解，是《微观红楼梦》的一大特色。作者舍弃了红学中常见的繁复考证、长篇大论的研究模式，而以散文化写作，因此《微观红楼梦》不同于那种艰深、晦涩的学院派红学——如胡适之先生所谓“猜笨谜”和俞平伯先生感叹“越读越糊涂”的考据文字，凸显出当下红学发展的另一流向——轻快怡人的学术随笔格调。这是戴萦袅这位80后青年女作家的文学性情和才情决定的。书名中“微观”一词，即已道出其自觉的学术追求和定位。

对于这种轻盈飘逸的散文学术论著，我一直持认可和赞赏的态度，因为学问之道，以多歧为贵，文无定法，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好方法。而且在学界也早有成功的显例。如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便是这一散文化写作的翘楚之作，其浓郁的文学色彩赢得了学界普遍的赞许。而《微观红楼梦》的作者又是一个青年作家，理所当然更应该欢迎和鼓励了。

不过，联系百年红学传统，在红学这一专门、高端的学科范畴里，似乎还有一个“合理性”问题需要辨析。

红学，这里特指胡适、俞平伯两先生创立于上世纪20年代并且流行至今的新红学，主

## 林黛玉家到底有多少财产？

——从青年学者戴萦袅新著《微观红楼梦》谈红学的重与轻

竺洪波

要的学术方式是考证（辨伪），史称考证派红学，胡、俞两公的经典红学著作分别命名为《〈红楼梦〉考证》和《红楼梦辨》，业已规定了红学的方法论特征，也由此形成了红学的学术品质——精深、庄严，“持重于大宗”。据新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先生为红学划定的对象：曹学、脂学、成书（版本）、探佚，一般的《红楼梦》文本阐释显然不在其内，文学鉴赏——如散文化方法所写的读红札记一类则尚未获得进入红学殿堂的学术“许可证”。

但是，正如红学界有识之士指出，这种理念已经不合时宜了。文本阐释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，“细读”则是普遍流行的学术方法。红学研究的对象未必局限在曹雪芹和脂砚斋两公生平、《红楼梦》成书过程和版本系统、历史原型和微言大义这些传统的话题；至于方法，只要符合学理、规范，言出有据，成一家之言，都是合理、可行的方法。当年作家王蒙、刘心武的红学著作曾被讥讽为肤浅、“不学术”，但无法忽视其客观存在的社会影响，现在已很少有人这样评价他们的学术成就了，

对红学作为学术的理解，也就出现了转变。这不禁让人想起钱穆先生的名言：一篇好的学术论文，一本真正“持重”的学术专著，重要的是里面有“人”，有作者的个性和性情。相对于“人”，方法和风格的重要性尚在其次。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红学，理应开放、多元，能够包容、吸纳不同的形态与方法。

其实，戴萦袅的《微观红楼梦》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学理逻辑和方法论规定，只不过它们隐藏在诗性的智慧和文采之中而已。它在“细读”文本的基础上，于不疑处有疑，发前人之未发，而一旦形成“一己之见”，则必作深入剖析，并征引各方文献予以旁证，在“微观”中显大旨，在性情中见真理，所谓轻盈飘逸，绝不是微薄肤浅、失重失范，而是深浅有度，轻重有节，由小及大，举重若轻。欣赏一下它对“消息”一词的阐释：

《红楼梦》描写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，醉酒后误入宝玉的怡红院，无意间撞开镜子的消息，显露出卧室门来。此“消息”究为何物？国内文献鲜有相关记载。戴萦袅从传统戏曲

《铁拐李》“火坑里消息我敢踏，油锅里钱财我敢拿”之句解释为机关。又从曹雪芹称其为“西洋机括”的线索在国外的专著中找寻旁证：英国汉学家大卫·霍克斯把刘姥姥撞开镜子的消息译作spring（弹簧），把宝玉划上的消息译作catch（门闩、窗钩、箱笼的搭扣这类）。中西互证，自成其理，经此解释，我们对“消息”的含义也就明白其大端了。

熟悉戴萦袅的人都称她为才女。她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又在海外名校留学，这种学业背景和经历，不仅使她博学多才，视野开阔，而且也养成了独立思考，不唯书不唯上的性格，对红学中的一些既有观点，她敢于提出质疑，展开争辩。如关于林家财产的见解，就值得我们注意。

印象中陈大康先生曾经著文考证林黛玉家底的财产，认为贾琏料理林如海身后事时顺带私吞了林家偌大财产，荣国府正是用这笔银子盖了富丽无双的大观园。对此，戴萦袅从文本中读出不同见解：一是林如海为人正直，不是“官场吸血鬼”，敛财有限；二是清朝吏治腐



《贾母接外孙女》曾作为邮票主题发行 戴敦邦绘

败，索贿贪污成风，林如海难免遭遇王公、权臣们的巨额勒索，家境不富甚或入不敷出也无不可能。这一解释的准确性如何，这里姑且不论，大康先生是学界权威，著名红学家，戴萦袅敢于提出不同意见，其新生代学人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锐气的确令人兴奋和欣慰。

总之，红学也要与时俱进，也要“接地气”，激发自身生气、活力，毋庸置议，《微观红楼梦》的广受欢迎，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它的学术价值，为“持重”的红学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。

（作者为华师大中文系教授）